

# 大城市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基于武汉—利川季节性人口流动现象的分析

徐晓军, 许金迪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大城武汉与小城利川之间大规模、季节性人口规律性流动的现象表明,受较高土地价格、承接低端产业转移、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外围往往被规划为城市的预留发展区域,没有成为城市中产阶层郊区化、逆城市化的首选区域。而远离城市、环境宜居的偏远小城却成为了城市中产阶层追求更加从容舒适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的实质性“郊区”,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郊区化的“飞地模式”。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实践是市民能动地追寻他们理想中的“郊区”所作的变通,是被抑制的郊区化需求的变相满足。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放缓、经济发展转入中速发展的背景下,充分尊重并多元化满足城市中产阶层的郊区化需求,将郊区化、逆城市化战略提上议事日程,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郊区; 郊区化; 逆城市化; 季节性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23)03-0138-10

**DOI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23.03.013

2021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sup>[1]</sup>,在整体上仍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将沿着S型曲线继续发展<sup>[2]</sup>。近几十年来,庞大的人口规模效益有力地助推了城市经济发展,但这种集中型城镇化战略也使得一些附带产物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在大城市日益显现。随着理想的生活需求与现实的城市空间差距越来越大,部分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产阶层会“用脚投票”,选择完全逃离或“半”逃离到郊区甚至农村,部分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开始显现。与此同时,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中国居民的生活观念悄然发生改变,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中国居民享受现代生活的方式之一,城市周边地区二日游、三日游的度假休闲逐渐成为时尚<sup>[3]</sup>。乡村休闲旅游人数逐渐增加、城市中产阶层到小城镇长期居住、离退休人群异地养老等现象在全国各地气候宜人的小城镇和乡村蓬勃兴起,这种现象可能并不是典型的逆城市化现象,即长期居住人口从城市流动到乡村。但正如学者李培林所言,相较于此前轰轰烈烈的挤进城市大潮,这些城里人为追求舒适生活涌向乡村的各种活动正是特殊“逆城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预示着未来的某种发展潮流<sup>[4]</sup>。

2013年以来,武汉与利川(隶属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两地之间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短期观光型、体验型旅游的季节性康养模式。利川逐渐发展成为了武汉市民最喜爱的旅游、避暑目的地之一。部分武汉市民就像冬天飞往温暖南方躲避严寒的大雁一样,一到炎热的夏天就前往利川纳凉,天气转凉后又回到武汉,因而也被形象地称之为“候鸟”<sup>①</sup>。他们不仅在利川居住长达2~5个月,而且在当地开发的康养、避暑度假区购买房产,安置第二个“家”。

一般来说,城市中产阶层到近郊休闲旅游、养老康养的行为被认为是人口外迁、逆城市化、城市

收稿日期:2022-10-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中的城郊村落共同体重建研究”(19ASH005)。

① 利川当地人和媒体将以健康养生、避暑康养为目的,每年到利川季节性旅居(1~6个月)的外来人群称为“候鸟”,也有学者采用舒适移民、生活方式移民、旅游移民、休闲移民、季节性移民等概念。

郊区化的典型表现。但利川距离武汉近600千米,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武汉郊区”的空间范围,却成为了武汉市实质意义上的“郊区”,被很多网友戏称为继武昌、汉口、汉阳之后的“武汉第四镇”<sup>①</sup>。这种跨地区、长距离的“郊区化”现象,与经典的大城市郊区化有什么区别与联系?我们该如何去判断、定性这种实质上的“大城市郊区化”现象?市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这种跨地域“郊区化”的形成机制如何?现有研究中对类似现象的描述并不少见,但是缺乏一个概括性的概念。为了更好地推进郊区化理论的建构,在借鉴“飞地”概念基础之上,本文将利川看作是武汉的“飞地郊区”,将这种跨越行政区域的郊区化暂时命名为郊区化的“飞地模式”<sup>②</sup>,对提炼郊区化的理想类型做出一点尝试。

本文以利川市及其所辖的谋道镇苏马荡度假区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法,围绕武汉市民的流动过程、生活形态以及苏马荡地区的发展进程等内容开展田野研究,在利川和武汉两地对36位到利川购买房产、康养、度假的武汉市民多次访谈,同时收集了20多位市民在社交网站上撰写的日志、随笔以及相关话题讨论,以期为以上问题寻找答案。

## 一、“候鸟”故事:武汉—利川季节性人口流动的整体图景

自2013年起,利川市依托凉爽的自然气候优势和便利的地理区位条件,不断提升旅游服务功能,着力打造休闲避暑、康养度假胜地。2016—2020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总数超过6437万人<sup>③</sup>,每年夏天来利川避暑的“候鸟”超过60万人<sup>④</sup>。其中,苏马荡作为家喻户晓的省级旅游度假区,常年入住度假的“候鸟”达30万人<sup>⑤</sup>,他们大多在苏马荡生活2~5个月,形成了季节性流动现象<sup>⑥</sup>。

### 1. 启程:寻找优质自然栖息地

类似于根据季节变化定时挑选合适栖息地的候鸟,一些武汉市民也困难耐城市酷暑想寻找一个清凉之地。在综合考虑环境适宜度、出行便捷度、经济承受度等因素后,他们选择了利川。

(1)逃离“火炉”武汉。武汉作为城市群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热源和热中心<sup>⑦</sup>,夏季来临后市内气温居高不下,且由于空气湿度较大、风速较小,常令人感到闷热难受<sup>⑧</sup>。而利川夏季平均气温与武汉相差10℃以上,曾于2018年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利川·中国凉爽之城”称号<sup>⑨</sup>。越来越多的武汉人在利川体验了“夏天不用吹空调、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的生活之后,青睐于逃离城市热岛到“凉城”利川,甚至“打算带全家人一起避暑”(访谈记录20210702Z)。

(2)避开不适郊区。对于武汉市民来说,逃离到城市周边舒适宜居的地方本应该是理性选择下的“最优解”。但是随着武汉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第二产业转移到了郊区(实质上是远城区),郊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污染、噪音等环境问题,而郊区的管理水平又比不上城市,所以城市郊区并未成为理想去处。有市民表示,“武汉毕竟是大城市,特别天然的地方已经不存在了,即使是木兰天池的气候、环境,还是比不上利川”(访谈记录20211020D)。

① 参见中国利川网.苏马荡“回来了”:避暑人数突破24万。<https://ilichuan.com.cn/szywcd13c831/2269243.htm>。

② 由于“飞地”一词在词语本身的意涵和语用上能够更加形象地描绘出本文提出的这种跨越行政区划、地域空间的特殊郊区化模式,因此本文所使用的“飞地”概念与原有含义不尽相同。利川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辖县级市,与武汉没有行政上的归属关系及毗连的土地。

③ 数据系笔者根据2016—2020年利川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而来。

④ 参见中国利川网.纳凉正当时!“凉城”利川吸引“火炉候鸟”。<https://www.ilichuan.com.cn/szywcd13c831/2268729.htm>。

⑤ 参见中国利川网.春风浩荡“候鸟”归:苏马荡度假区做好“迎峰度夏”准备。<https://ilichuan.com.cn/html/zglcw/pc-szywcd13c831/20200420/1974316.html>。

⑥ 2008年前后,部分重庆万州市民为夏季避暑,从苏马荡亲戚处购买宅基地自建或联建多层楼房,富余楼层对外出售,以及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建小产权房售卖,形成了“避暑房”市场。后因国家叫停小产权房,最终倒逼政府介入,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监管,利川正式走上作为重庆、武汉两大火炉城市季节性流动人口承接地的发展道路。苏马荡地区从当初几万人的小乡村,到2021年末发展成为常住人口达30万,规模堪比中等县城的城市“后花园”。2017年以来,尤其是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利川的候鸟群体来源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武汉市民大幅增加,2021年已与重庆市民“平分秋色”。可以预期,未来武汉市民的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为方便分析,本文仅以武汉与利川之间的人口季节性流动为样本展开研究。

⑦ 见湖北省气象局官网:利川荣获“中国凉爽之城”称号。[http://hb.cma.gov.cn/wzsy/zxdt/201906/t20190618\\_713403.html](http://hb.cma.gov.cn/wzsy/zxdt/201906/t20190618_713403.html)。

(3)瞄准宜居利川。最初到利川避暑的武汉人只是短暂的避暑旅游,大多是在亲朋好友的推荐下抱着假日游玩的试探性心态来小住几日,但此后不少人萌生了整个夏天都在此避暑的想法。“苏马荡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地方”是众多旅客的内心真实写照。在这个过程中,利川也从一个旅游避暑之地变成康养度假之地,成为武汉真正的后花园。

### 2. 停留:利川作为“第二故乡”

区别于一次性过客型的普通旅游者以及永久迁移者,这些追求舒适生活的武汉人通过置办房产、租赁或其他方式在利川居住,并表现出春夏来秋冬去的季节性,具有明显的“半旅游,半生活”的居停生活特征。

(1)置办康养专用房。已有研究、新闻报道、实际走访调查等各种数据显示,大部分季节性流动人口都是四十五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且离退休者居多。为了满足他们的长期避暑需求,当地房主及房地产开发商也迅速做出回应,修建、改造了大量避暑小区。2021年1-8月,利川售房4964套,外地业主占到23.82%,其中武汉、重庆等地居民占一半以上<sup>①</sup>。

(2)创造第二个“家”。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居所与精神象征意义上的家具有千丝万缕、不可分离的联系。如果说利川一开始只是一个和众多康养胜地并无太大区别的清凉地,那么随着他们在利川居住次数的增多并置办固定的避暑房,武汉人与利川之间的联系就不仅依赖于清凉的气候,这一纽带在日常生活的调味下具有了多重属性。给予候鸟们“家”一般温暖的还有社区这个大家庭,“小区的氛围也很好,业主们团结友爱,物业服务也很到位”(访谈记录20211015W)。苏马荡部分小区还成立了书法、阅读等兴趣协会、老年大学以及流动党支部,文化建设蓬勃开展。武汉市民们的社交圈从亲友圈向邻里圈、“候鸟”圈扩散,进而实现了从旅游者向生活者、从“候鸟人”到“新利川人”的角色转变,他们正在利川书写丰富的“候鸟”故事。

### 3. 乐居:悠然在利川

利川最开始以其独特的避暑条件吸引众多武汉市民前来。但随着旅客居住时间的增加,利川天然无污染的方方面面吸引他们停下脚步,留在此处享受生活。

(1)追求生活环境的品质——回归自然生活。利川成为城市居民理想的栖息地,在这里,呼吸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享用天然无污染的农家菜都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武汉郊区的度假区尽管地理位置优越,环境条件却远赶不上利川。一些退休老人“希望找个清静的地方养老,而空气质量差的城市及其周边难以找到像利川这样的地方,即使能找到,价格也让人却步”(访谈记录20211025L)。

(2)追求精神生活的升华——心灵找到归属。随着既有城市居住空间的异质化与复杂化,越来越多的武汉人也渴望简单自然的生活。“住在苏马荡就好像天天都在旅游,四处走走看看风景心情就很好,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不仅静心,还让整个人都觉得更年轻了”(访谈记录20210721Z)。利川看似平淡的慢节奏生活极大程度地满足了都市人逃离城市的污染与喧嚣、追求轻松自然之乐的需求。

## 二、大城市郊区化的“飞地模式”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郊区化这一概念主要是由中西方学者在总结世界各国、城市的发展形式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加以概括的。在总体上向城市集中的城市化高速发展和个体层面的向郊区、乡村分散的郊区化、逆城市化不断涌现的“叠加”情况下<sup>[7]</sup>,武汉—利川季节性流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大城市郊区化的图景。

### 1. 居住郊区化

在对西方城市发展周期的研究中,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郊区化是一种分散性城市化,即城市中心向郊区离心扩散,原来的城市边缘地带发展成为城市的一部分<sup>[8-9]</sup>。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郊区不仅是空间形态上的演变结果,更是人类日常生活的载体<sup>[10]</sup>。不论是作为城市发展过程

① 参见荆楚乡村振兴网:湖北利川:“凉资源”托起“热产业”。<http://xczx.cnhubei.com/2021/0915/423006.shtml>。

中的一个阶段、一种人口迁移趋势,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郊区化实则是人的郊区化,其本质是逃离城市的人群逐渐向郊区聚集的过程。城市居民因种种原因逐渐离开繁华都市,选择“归隐”郊区,郊区人口增长,城市增长缓慢甚至停止、流失。

郊区化的核心是人的郊区化,武汉人的年年流动恰是对这一内涵的生动诠释。尽管武汉与利川相隔约600千米,但利川舒适的气候与宜居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武汉人前来避暑、康养。据利川市统计,苏马荡所在的谋道镇原本是一个常住人口不足2万人的小集镇,2018年夏季涌入苏马荡的外地游客峰值达到25万人,且绝大部分是城镇人口<sup>[11]</sup>。不同于来去匆匆的过客,这些武汉人在利川购置专用的避暑房产用以旅游康养,把利川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部分退休人群还发动全家一起度假,每年在利川居住时间长达数月至半年,更有一些市民挑战在利川过冬。尽管一些客观现实原因使得他们不可能完全离开城市定居利川,但是每年近乎固定的季节性“移居”已经让他们对利川产生了归属感、依恋感,也逐渐产生了“自己也是利川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跨越空间的流动恰可看作是便捷的交通与优越的环境共同促使同省境内的利川“飞”过层层阻碍,成为武汉市民真正意义上的郊区。当然,这种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武汉就此进入郊区化阶段,只是相较于向城市集中的大趋势来说,武汉人向利川的流动或可看作是预示未来潮流的先兆。

## 2. 产业郊区化

中西方大城市的郊区化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差异性<sup>[12]</sup>,但如果仅从外在表现形式加以考察,郊区化是人口的外迁,亦是产业的外迁。由于城市发展迅速、用地紧张,部分产业不得不向市中心外围迁移以分担城市功能。在欧美国家的郊区化浪潮中,郊区逐渐从承担工业的单一功能单元,发展到因人群不断聚集、城市交通日益拥挤而承接不断扩展的商业、就业、居住等多功能的综合体。中国部分城市的郊区化主要得力于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城市土地有偿制度。1980年后,政府主导下的工厂、企业外迁与园区建设促进了郊区的快速发展,许多零售业、娱乐业等商业性服务也开始向郊区转移。这些商业中心以高质量的服务、宽敞舒适的环境满足部分城市居民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城市商业功能逐渐向近郊扩展、分散。

利川蓬勃发展的康养度假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武汉郊区的康养功能。郊区总归是城市的郊区,而非农村的郊区<sup>[9]</sup>。由于城市的“过密”发展难以满足部分富有阶层对生活品质的需求,郊区本该是保证便利生活的同时创造低密度、高品质的居住环境的最佳选择。但武汉的东西用地拓展已几乎突破行政边界<sup>[13]</sup>,由于耕地控制“红线”、生产要素成本的制约,仅建大量独立住宅区所需之土地已难以满足,更不用说依托森林、湖泊等优越自然环境条件了。康养旅游产业在“飞地郊区”利川的蓬勃发展意味着城市功能向郊区的扩展与分散,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城市与飞地之间的“双赢”。

## 3. 住宅分布郊区化

广义的郊区化认为郊区化的主要指标包括人口、土地利用、城市性功能因素和农村性功能因素。土地利用方面,郊区化意味着农用地转换为非农用地,但少有高密度的高层建筑群,低矮建筑低密度分布,住宅以带草坪的别墅为主,交通、娱乐等配套设施完善<sup>[12]</sup>。尽管城市规划考虑到了人对绿化面积的需求,但相较于植被覆盖率较高的郊区和乡村地带,城市耕地紧缺且地价高昂,并且因为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过分追求,使得开阔的视野、宽松的环境被越来越密的高楼大厦所替代,热岛效应和水泥沙漠随处可见。为了分担城市空间的压力,众多郊区住宅项目得以兴建,宽松、开阔的低密度居住环境吸引了部分中上层阶层居民向郊区聚集。

利川武汉人的住宅空间分布具有上述典型的郊区住宅特征。如在苏马荡20平方千米的深山密林间,尽管已开发的商品房小区达到60个以上,总体量超过300万平方米,绝大部分小区的容积率低于2,部分小区甚至低至0.18<sup>①</sup>。而在武汉,分布在主城区较为核心地段的住宅容积率基本都大于4,只有大部分位于远郊区的别墅、小高层及高层等住宅的容积率低于3。不仅如此,苏马荡的众多住宅小区及其配套设置以低密度建筑群为主,少见高层建筑,住户不仅可以享受独栋的清净,还能感

① 数据系作者调查苏马荡小区情况时所得。

受到生活视野的通透性。小区内小径、亭台等休憩场所的布置也强调“人性化尺度”“舒适”“有趣”，一些小区还专门预留了门前屋后的小菜园，小花圃，更加满足部分人群远离拥挤城市，追求田园牧歌式生活空间的需求。在小区周边环境方面，小区外部的交通、购物等设置配备完善，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总之，利川的生活既躲避了“过密化”城市发展中的不适，又能享受到较为便利且天然的生活，是城市人逃离拥挤、追求宽松环境的主动选择，具有很强的居住郊区化特征。

#### 4. 生活郊区化

在欧美国家的城市郊区化阶段，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很多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的城市人开始向城市边缘的郊区地带聚集。郊区化不是单纯的可直接考察的人口流向或空间演变，而应综合考虑人们生活的多方面特征，如生活方式、社会属性、个体主观感知等。正如城市社会学学者 Wirth 提出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生活”一样，郊区化也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sup>[14]</sup>。Fava 概括了美国郊区性质，认为“郊区”实际上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建构，主张用“生活方式”来替代人口规模、密度、异质性、土地价值及其他与环境有关的数据等物理维度来衡量郊区<sup>[15]</sup>。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郊区化过程突显了其大都市区特有的人口分布形态，白人中产阶级和社会上层人士在郊区逐步会合，形成了相对独特的郊区生活方式和郊区文化<sup>[12]</sup>。基于此，郊区化实质上是中产阶级自发远离城市以追求身份象征、提升生活品质、实现价值满足的产物，代表着一种城市生活方式逐渐转变的过程<sup>[16]</sup>。

武汉市民不远“千里”往返利川所追求的自然闲适、与城市生活环境截然不同的生活，就是郊区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生动体现。在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基础之上，已经拥有较好物质基础的武汉中产阶级，更崇尚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质量，追求精神寄托和深层次的文化需求，是典型的“舒适物买家”与“生活方式追求者”<sup>[17]</sup>。许多来利川康养度假的武汉人都觉得利川的生活更加丰富，他们能够尽情享受天然“氧吧”下户外运动的畅快，闲暇时种菜养花的田园闲情，邻里社区里丰富的文化参与以及和睦的相处氛围等等。利川的生活正是他们逃离城市的喧闹，追求生活品质与精神满足的体现。

#### 5. 跨越空间界限——郊区化的“飞地模式”

武汉—利川之间固定的季节性人口流动模式，虽然符合郊区化的诸多特征，且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季节性特征也意味着城市人并没有完全与城市脱离，就像郊区作为城乡过渡地带一样，城乡粘连特征明显。但这种跨越空间界限的流动模式实则是一种新型的郊区化模式，其特殊之处在于，利川尽管发挥了作为城市郊区为城市的持续运行接力的功能，却并非传统意义上从地理空间角度定义的郊区。现有研究中对于郊区的定义都是与城市相联系的，都强调了郊区在空间意义上是城市的边缘地带。郊区在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与市区有密切联系，但在地理位置和经济功能上是城市的“边缘地区”<sup>[18]</sup>。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城市的发展没有将城市边缘地带发展为实质意义上的郊区，而是不断地采用“摊大饼”、无序扩张蔓延的方式将这些城市边缘地带复制为城市建成区。但是郊区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过于强调郊区的空间性质反而狭隘了其概念广度。如果某一地区与城市的联系十分密切，在各个维度都体现了“郊区”特征、承担了郊区的功能，而仅仅在地理位置上与城市分隔，又何尝不能视作一块“飞地郊区”？

“飞地”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1526年签订的马德里条约上，指的是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因不同的原因产生的飞地具有多种类型，如历史飞地、经济飞地、民族飞地等等。总之，“飞地”所强调的特点之一正是该地与本区在地理位置上分隔两地。基于现实经验与已有研究的碰撞，本文借鉴“飞地”概念，以“郊区化‘飞地模式’”来概括诸如武汉—利川季节性流动这类跨越空间界限并在诸多方面与以往对于郊区化的界定不太贴切的大城市郊区化现象。区别于季节性的旅游康养，郊区化“飞地模式”的突出特征在于武汉城市人在“飞地”购置了相对固定的房产作为季节性流动生活的“根据地”，同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将其与一般旅游行为区别开来。

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郊区化，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是郊区化的“飞地模式”意味着郊区突破了空间界限，在地理位置上“摆脱”了城市，而不仅仅是依附于市中心的模糊地

带。二是郊区化的“飞地模式”是一种季节性的郊区化。和许多为了享受郊区生活方式的城市居民所采取的“工作在城市,居住在郊区”这种职住分离模式类似,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则可看作是度假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分离。由于城市中依然存在许多无法割舍的要素如亲情、医疗、教育等,城市居民们发展出了这种“候鸟式”季节性郊区化模式。三是伴随着季节性流动所表现出的居所的备用性。不同于完全离开城市搬到郊区的花园别墅,市民们在“飞地郊区”的居所更像是“后花园”,故也只能称之为“第二个家”。

### 三、大城市郊区化“飞地模式”的形成机制

利川苏马荡距离武汉600千米,却成为了武汉实际意义上的“郊区”,从而出现了大城市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大城市市民们为何略过城市郊区空间而直接前往市域之外的小城镇甚至乡村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可以参照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将城区、郊区与乡村看作是一个连续谱的观点,站在城市—城市郊区—飞地(小城市或乡村)的序列中考察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如何在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图1)。

#### 1. 郊区生活需求催生郊区化实践

在城市化的成熟期,城市居民的郊区生活需求强烈,催生出各式郊区化实践。与此同时,中国老龄人口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出于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对保持健康的向往,倾向于远离城市喧嚣,寻找合适的养老居住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城市居民的郊区生活实践。

(1)逆城市化预示郊区化发展。根据欧美国家100年到200年的城市化演进规律,在城市化发展中后期较为乏力之时,城市化速度会逐渐变慢,并开始出现城市人口迁往郊区、乡村的现象,逆城市化时代随即而来。针对这种现象,早期的诸多城市社会学研究者指出,这是由于城市化发展过快吸引了巨量人口涌入城市,密集、异质性高的生活环境会导致社会超负荷,不稳定性急剧增加。

因此,郊区逐渐成为中产阶层带有阶级自豪感的价值选择,郊区化也意味着城市人对特定生活品质、个体主观感受的追求。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北京市54.5%的人有意愿到郊区进行投资,70%的人有意愿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上海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人士希望过上周一到周五在市中心上班,周末在农村休闲的“五加二”式生活<sup>[19]</sup>。在全国各地兴起的乡村休闲旅游、从大城市到宜居小城市甚至农村异地养老或者长期居住等现象也都表明:大城市民逃离城市的各种活动规模日益增长,其郊区化需求、逆城市化需求正在快速扩大。与北京上海同步,近年来武汉市郊区住宅市场发展迅速,武汉市居民在郊区的购房意愿调查发现,住宅价格、住房产权、自然环境、交通情况等均会影响居民郊区购房意愿,其中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大<sup>[20]</sup>。可见,随着逆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到来,现有的城市环境越来越难以满足市民的追求,其生活压力需要郊区提供舒适、自然的生活体验加以排解。

(2)老龄化助推郊区生活实践。中国于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整体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到13.5%<sup>[21]</sup>。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生活质量、居住环境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对寻找一个有利于健康的养老居所具有十分直接的渴望。不仅如此,越来越多即将步入老年的中年人也“未雨绸缪”,积极地为今后的老年生活创造条件,做好相关准备。2019年底的数据显示,武汉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194.25万,占总人口21.43%;65岁以上老年人口133.58万人,占总人口的14.74%<sup>[22]</sup>。随着武汉市已迈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其日益严峻的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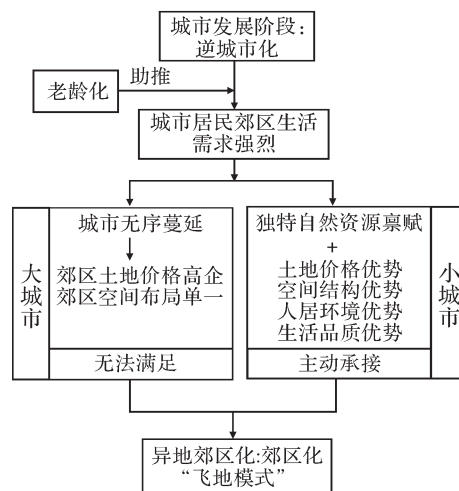


图1 郊区化“飞地模式”的形成机制

老需求急需满足。与此同时,考虑到独生子女未来的压力,不少武汉人开始提前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寻找生活成本较低且有品质保障的居住地。可见,老龄人口比例的不断增长以及中年人养老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催生了郊区化的需求。

## 2. 大城无序扩张迫使市民“舍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且呈现出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控制土地和资本等资源要素来推进城市建设和开发,依靠郊区化扩展城市空间的特点<sup>[23]</sup>。在城市“摊大饼”的过程中,“郊区化”只是城市化的副产品。相应地,城市郊区也隐匿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城市不断向外延伸、蔓延的副产物。大城市郊区被动的发展状态,阻碍了市民高品质生活郊区需求的满足。

(1)土地财政激发城市郊区地价高企。1994年中国推动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将征收的农业用地转换为城市国有土地,从而以出让、抵押以及征税等方式持续保证税收。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征收和出让郊区土地,以高额土地收益补贴工业生产,从而保证经济繁荣。正是在此背景下,武汉的空间格局自此发生剧烈重组,制造业加速向近郊开发区集聚。截至2013年,三环外四大制造业集聚区即青山经济开发区、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基本形成<sup>[24]</sup>。在高额收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一方面依靠出让土地来满足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推动土地交换价值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满足资本积累和向郊区扩张的目的<sup>[25]</sup>。在基础设施不断加强的过程中,房地产开发成为“帮凶”,刺激相关产业链需求不断扩大,从而有助于收入高额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所有,实现郊区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同时,由于土地储存制度的特殊性,城市政府通过限制供应量维持土地高价,以“非饱和”供应的方式促使市区、郊区的土地价格一路高升<sup>[26]</sup>。

(2)城市郊区发展难以满足市民需求。城市用地扩张的背后实则是城市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价格置换,而大量耕地资源的侵占不可能持续进行,终将阻碍城市正常发展<sup>[27]</sup>。主城区产生的排斥力和郊区产生的吸引力二者之间的推拉导致大量企业迁出中心区,同时,为安置中心城区的搬迁人口以及满足郊区工业发展的人口迁移,众多住宅项目得以兴建,郊区在缺乏合理规划的快速开发下形成了碎片化、单一式的利用格局<sup>[28]</sup>。这不仅意味着郊区在功能上不得不依附于城市,也使得郊区环境日益拥挤、复杂,空间形态意义上的“郊区化”与市民们所期望的实质意义上低密度、高品质住宅和休闲舒适的生活“郊区化”背道而驰。正因为如此,尽管武汉目前具备优越环境的度假区在分布上呈现出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布局方式:主城区形成东湖新城社区养老院—东湖银龄养老院的低密集区,远城区以黄陂木兰天池—木兰山、蔡甸九真山风景区、江夏梁子湖风景区为核心<sup>[29]</sup>。但总的来说尚未形成规模,并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此外,在城市用地面积剧增、土地价格居高不下的宏观背景下,武汉中心区及其周边地区也难以满足市民需求,市民只好另寻他处。

## 3. 小城互补优势吸引市民“求远”

与大城市相比,“飞地郊区”更加“地广人稀”,土地价格与空间环境优势明显,更易形成松散、多样化的空间结构,从而对市民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利川市的苏马荡原本只是一个人口不足500的土家族乡村,在部分地产开发商觉察到商机并开始到此进行旅游地产开发后,当地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发展旅游康养。苏马荡逐渐从一个旅游小城变成大城市的后花园,吸引越来越多的武汉、重庆市民到此季节性居住。

(1)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吸引“候鸟”变“留鸟”。吸引武汉人不远“千里”前往的正是利川因占据天然区位优势而具备的良好自然环境。利川地处神秘北纬30度,海拔1100米,夏季气温常常维持在22℃。作为一个山地小城,利川森林覆盖面积广,空气清新,不同时段、不同角度还能够欣赏不同的气象美景,如云海、雾凇等。可以说,宜人的气候与舒服的温度就是利川最宝贵的资源。利川一开始也正是作为一个避暑地,以“凉爽之城”的盛名吸引众多武汉人前往游玩。“世界那么热,就贪利川那点凉”体现了众多旅居康养之人对利川的赞赏。随着他们被利川优美的自然风光与舒适宜居的环境所

吸引,一方面“凉都”利川的名声逐渐向外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利川以宜居的气候、优良的空气质量、动人的美景、丰富的绿色有机食物等诸多优势为市民提供了健康的生活环境,使得市民们开始规划固定的季节性“移居”,最大限度地享受利川凉资源。武汉市民们开始在利川安置“第二个家”,年复一年的季节性往返于武汉和利川之间,在利川驻足休憩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2)土地价格优势和空间结构优势。小城的土地价格优势不仅对买家的经济能力要求较低,也使得小城的多种空间形态得以共存。一方面,较低的土地价格意味着房地产商购置土地成本低,可获得的利润空间更大,而房地产商出于盈利目的,不会过度开发房地产项目。为了吸引购房者,房地产商往往会更加注重房屋的类型与质量,并以此为卖点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房。在“飞地郊区”上,大多数楼盘被开发成低密度、低楼层的洋房,而且房价对大多数人更友好。以2021年武汉市与湖北其他城市的商品房平均售价为例<sup>①</sup>,武汉市5个远城区的房价大部分高于其他地级市城区房价。武汉市主城区<sup>②</sup>平均房价为20399元/平方米,市远城区(空间上的郊区)房价分别为:东西湖区12909元/平方米,蔡甸区10665元/平方米,江夏区13829元/平方米,黄陂区10637元/平方米,新洲区7428元/平方米,汉南区7622元/平方米。而正与武汉处于同城化进程中的鄂州市区仅为5792元/平方米,经济水平在省内排第二的襄阳市区仅为8548元/平方米,旅游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的恩施州州府所在地恩施市区也仅为6271元/平方米,仅相当于武汉主城区的30%。而作为非地级市州府的县城房价就更低,如苏马荡所在的利川市(县级市)仅为6130元/平方米。较低的房价决定了较低的生活成本,这也是城市老年人及中年人为应对未来养老风险的理性选择之一。另一方面,非省会城市特别是县城对土地的征用进程相对缓慢,征地范围较小,农村的自然景色与生产方式得以保留。“飞地”郊区的土地类型兼具城市用地和农业用地,土地利用方式多样,不仅有城市建设用地、农业耕地的利用形态,还有林地、山地、河流、湖泊等自然空间形态,其生态环境得以保持良性循环。

(3)人居环境优势和生活品质优势。“飞地郊区”很好地保留了城市和乡村两种生活形态,使得聚居在“飞地郊区”的中产阶级有机会暂时忘却城市的喧闹浮躁,享受慢生活。Gosnell等将“基于自然或(和)文化舒适性的吸引流动的个体”概括为“舒适移民”<sup>[17]</sup>。Moss认为,舒适性迁移是指人们向环境质量更好、文化差异化更高的地方迁移;虽然不同动机如经济利益、人身安全等相互交织,但首要目的是寻找独特的文化和自然环境<sup>[30]</sup>。对于长期生活在武汉的市民来说,利川有着与强调现代性与集中性的城市完全不同的舒适性系统:一是健康的居住环境。和大气悬浮物、二氧化硫、灰尘及噪音等污染指数居高不下的大城市相比,利川苏马荡空气质量优良、环境空旷明净,是武汉市民理想的居住环境。二是慢节奏的自然生活。这些季节性流动的武汉市民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移民,而是逐渐在苏马荡及所在的利川市扎根,并具有转化为精神性移民的长期趋势。一些老年流动者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目标,找到了老年时期的人生价值,并通过准确的自我判断巩固了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的形象<sup>[31]</sup>。

## 四、结论与讨论

武汉—利川季节性人口流动现象表明,大城市郊区化并不只是城市从市区向城市周边地区不断发展与延伸的单向过程,郊区化的“飞地模式”未尝不是一种实现路径。现代交通的发达以及地方独特的自然优势使得郊区不只局限在城市周边,可以跨越空间界限承担城市的部分功能。远离城市、环境宜居的偏远小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追求更加从容舒适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的实质性“郊区”,从而形成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在城市化发展成熟期,城市居民的郊区生活需求强烈,同时中国正逐渐进入老龄化时代,选择在高品质、慢节奏的流动中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追求自我、享受生命的时尚与潮流。受土地价值差异的影响,城市郊区不断承载城市“推挤”的人口及产业,其发展过程与城市居民的需求渐行渐远,最终沦为“边缘城市”附属物。“飞地郊区”则依托自身的独

① 数据系作者根据安居客官网统计数据(2021)整理而来。

② 具体包括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青山区、武昌区和洪山区。



特自然资源禀赋与多方优势打造优质生活环境,吸引无法“落脚”的城市中产阶级,逐渐形成人口聚集效应,进而成为事实上的高品质生活郊区。

武汉—利川之间季节性人口流动现象所形成的城市郊区化的“飞地模式”,能较好地解释规模持续增长的大城市民跨越行政区划,到气候宜人小城及周边购买房产居住的季节性人口流动现象。其中较典型的如广西北海、海南三亚下属各县区打造的全国城市“飞地郊区”。近年来广泛兴起的、目标瞄准大城市的各类康养小镇、度假小镇、温泉小镇,作为城市“飞地郊区”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可见,这种模式更多发生在现有条件难以满足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与具有宜居环境的中小城市甚至小镇、乡村之间。而“飞地郊区”之所以能吸引较大规模的跨区域人口流动,成为大城市居民们的选择,也正是因为所独特的自然气候与资源禀赋。尽管郊区化“飞地模式”的产生与大城自身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但“飞地郊区”所具有的难以模仿也无法塑造的“一城一品”特色是形成这一模式不可或缺的因素。

那么郊区化的“飞地模式”是否就真的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发展正式步入了郊区化、逆城市化阶段?基于本文的分析,郊区化“飞地模式”的产生正是根植于时空压缩背景下中国特殊的发展状况,即城镇化、郊区化、逆城镇化“叠加”<sup>[4]</sup>。在大量人口不断挤入城市的同时,部分城市人开始着眼于寻找远离大城市病、环境优质的理想栖息地,追求品质生活。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实践是具有能动性的居民追寻他们理想中的“郊区”所作的努力。值得深思的是,这一现象的存在具有代表性意义:其本身即为城市居民的主动探索,所反映的恰是在推进大城市郊区即城市边缘的发展过程中,决策者部分忽略了人民生活和精神上的多元诉求,忽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本身。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放缓、经济发展转入中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尊重并多元化适应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各级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沿着这一思路,郊区化的“飞地模式”作为一种大城市郊区化的特殊模式,似乎为今后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一点参考,未来有可能成为大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的示范样例加以推广。

##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2-02-28)[2022-04-05].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
- [2] 王兴周. 乡村振兴背景下逆城市化动力机制探析[J]. 江海学刊, 2021(3): 98-108, 255.
- [3] 周玲强, 黄祖辉. 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 经济地理, 2004(4): 572-576.
- [4] 李培林. “逆城镇化”大潮来了吗[J]. 人民论坛, 2017(3): 60-61.
- [5] 易予晴, 龙腾飞, 焦伟利, 等. 武汉城市群夏季热岛特征及演变[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5, 24(8): 1279-1285.
- [6] 王硕, 童洁, 刘超, 等. 武汉气候舒适度与游客网络关注度年内变化相关性分析[J].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3, 8(3): 24-28.
- [7] 徐晓军, 张楠楠. 从“单线推进”到“空间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实践历程与发展进路[J]. 河南社会科学, 2019, 27(12): 108-114.
- [8] 王倩. 边缘城市: 郊区生长、机会吸纳与空间疏离[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2): 57-65.
- [9] 周一星, 孟延春. 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J]. 城市规划汇刊, 1998(3): 22-27, 64.
- [10] CLAPSON M. Suburban century: social change and urban growth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M].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3: 1-2.
- [11] 刘畅, 林晶. 苏马荡渐别“成长的烦恼”[N]. 湖北日报, 2018-08-10(9).
- [12] 徐晓军.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类郊区化”及其战略调整[J]. 求索, 2018(6): 97-104.
- [13] 孙晓敏, 张晓莹, 袁鹏洲. 跨行政区划的武汉大都市区发展路径思考[J]. 中外建筑, 2017(8): 84-88.
- [14] WIRTH L.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44(1): 1-24.
- [15] FAVA S.F. Sub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6, 21(1): 34-37.
- [16] 张艳, 柴彦威. 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12): 1723-1731.
- [17] GOSNELL H, ABRAMS J. Amenity migration: diverse conceptualizations of drivers, socioeconomic dimension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J]. Geo journal, 2011, 76(4): 303-322.
- [18] 顾朝林, 陈田, 丁金宏, 等. 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特性研究[J]. 地理学报, 1993(4): 317-328.
- [19] 朱进芳. “逆城市化”何以能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助力器[J]. 理论建设, 2013(4): 74-76, 22.

- [20] 黄烈佳,郭竞璟.基于Lars-Lasso的居民郊区购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9(9):90-96.
- [21]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EB/OL].(2021-05-11)[2022-04-05].[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81.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81.html).
- [22]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武汉市人口老龄化形势分析[EB/OL].(2020-08-31)[2022-04-05].[http://wjw.wuhan.gov.cn/zwgk\\_28/fdzdgnr/tjsj/202008/t20200831\\_1440011.shtml](http://wjw.wuhan.gov.cn/zwgk_28/fdzdgnr/tjsj/202008/t20200831_1440011.shtml).
- [23] 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7):82-100,204-205.
- [24] 黄亚平,周敏.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6(6):54-64.
- [25] 章征涛,刘勇,王一波,等.资本积累视角下城市郊区化机制及效应探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6):59-65.
- [26] 彭山桂,李敏,王健,等.土地资源错配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效应与形成机制[J].中国土地科学,2022,36(8):55-65.
- [27] 张笑寒.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的用地问题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51-54.
- [28] 吴缚龙,沈洁.中国城市的郊区开发和治理[J].国际城市规划,2015,30(6):27-33.
- [29] 谢文彩,李星明,向兴,等.武汉市康养旅游地空间布局及其优化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52(1):147-154.
- [30] MOSSLAG. The amenity migrants: seeking and sustaining mountains and their cultures[M]. Wallingford, Oxfordshire, UK: CABI, 2006.
- [31] 高夏丽.老年旅游的发生机制及旅游体验的意义建构——基于活动理论的视角[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3):116-123.

## The “Enclave Model” of Urban Suburbanization: Analysis on Seasonal Population Movement Between Wuhan and Lichuan

XU Xiaojun, XU Jindi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large-scale seasonal population movement between Wuhan and Lichuan indicates that peripheral areas of cities in China are often designated as reserved development zone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higher land prices, the transfer of low-end industries, and relatively lower levels of management. And these areas are not the first choice of sub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for urban middle class. Instead, remote towns that are far away from cities and have a livable environment have become the substantive “suburbs” for the urban middle class to pursue more comfortable and relaxing living space and lifestyle, thus forming the “enclave model” of sub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actice of “enclave model” of suburbanization is a compromise made by citizens to actively seek for their ideal “suburb”, while satisfying their suppressed demand for suburbanization. As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slow down and the grow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omes moderate, it is important to fully respect and diversify the demands for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rban middle class and put sub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strategies on the agenda for China’s futur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uburb; suburbanization; counter-urbanization; seasonal population movement

(责任编辑:陈万红)